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潘諾夫斯基話語中作為策略與意義的比較—哥特建築／經院哲學

Comparison as Strategy and Significance within Erwin Panofsky's Discourse: Gothic Architecture/Scholasticism

doi:10.6154/JBP.1996.8.008

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 (8), 1996

Journal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8), 1996

作者/Author : 鄒暉(Hui Zou)

頁數/Page : 99-10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 1996/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154/JBP.1996.8.008>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潘諾夫斯基話語中作為策略與意義的比較—— 哥特建築／經院哲學

鄒 暉\*

## COMPARISON AS STRATEGY AND SIGNIFICANCE WITHIN ERWIN PANOFSKY'S DISCOURSE: Gothic Architecture/Scholasticism

by  
Hui Zou

摘 要

本文通過對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論著《哥特建築與經院哲學》(1957)的解讀與詮釋，追尋其文本中比較的運作線索與痕跡，呈現“比較”作為建築話語中的策略與意義的雙重身份。

### ABSTRACT

This paper seeks the clue and traces of the comparative operation within text, and tries to present the twofold identity of comparison as the strategy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architectural discourse through interpreting Erwin Panofsky's book "Gothic Architecture and Scholasticism" (1957).

### 壹

在開始展開其話語之時，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首先提出一個問題：什麼是“時代”？根據牛津大辭典所釋，時代意指“歷史中具有顯著特徵的時期”。潘諾夫斯基認為，要具有顯著特徵性，就應該具有明確的“統一性”，它可能通過在不同現象諸如藝術、文學、哲學、社會與政治、宗教運動等等之間發現內在的“相似性”而獲得。對相似性的追尋可能會引向一種“平行”追蹤。潘諾夫斯基已經預感出平行追蹤中的可能災難：“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完美地掌握一個以上的領域”(註1)。然而，潘諾夫斯基通過在一個較小的時空範圍中展開類比分析來為他的哥特建築／經院哲學之

間的平行研究提供理由：同一個短時期內和同一個狹小的地理範圍。他認為在此小而明確的時空間框架中存在著哥特建築／經院哲學之間的明顯共性。

我們將小心謹慎地追蹤潘諾夫斯基寫作中的比較操作，考察他的比較展開了些什麼又是如何地展開，並由此試著獲取其中隱藏的東西。

潘諾夫斯基首先通過展示在那個時期法國的建築與哲學之間的背景相似性來開始他的比較進程。

#### 建築：

加洛林王朝的(Carolingian)藝術復興；  
羅馬風的多樣性與對立性：何紹(Hirsau)學派的簡朴風格，諾曼底與英格蘭的極端結構主義，南部法國與意

收稿日期：民國82年10月。 通過日期：民國83年6月。

\*中國上海，同濟大學建築城規學院建築系講師，工學博士。

\*Lecturer (PhD),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P.R.China

大利的豐富原古典主義。

哲學：

斯科特(John the Scot, ca. 810-877)現象；

眾多流派的多樣性：不妥協的信仰主義，無情的理性主義，赫爾德伯特(Hildebert)、瑪伯德(Marbod)以及夏特(Chartres)學派的原人文主義等等。

可以說就潘諾夫斯基看來，背景的最大相似性就是“多樣性與多重性”的感覺。

他隨即給出兩者之間時空上的相似性：早期哥特與早期經院哲學都誕生於同一個時期與同一個地點。這一新的思維風格與新的構築風格產生於一個圍繞巴黎為中心並以小於100英里(161公里)為半徑的地區，並在那裡持續了150年。

在盛期哥特與盛期經院哲學之間也存在同樣的時空相似性：兩者都發生於十二世紀初始，在那時盛期哥特體系在夏特與索依森(Soissons)取得了它的首次勝利。兩者的頂盛時期都是聖·路易斯王朝時期(1266~1270)。

**盛期哥特：**

如盛期經院哲學一樣。

接著，他再次給出了時間的相似性：在1231年兩者都實現了其頂盛的象徵。

由德·蒙特里奧設計的聖丹尼斯(St. Denis)大教堂的新中廳。

另一個時間的相似性被給出。在1270年左右，這是盛期哥特的末期，也是象徵著盛期經院末期的聖路易斯的去逝之時。他認為在那個時候有一種走向非中心化趨勢的相似性，從中心走向邊緣：至南部法國、意大利、德意志國

**晚期哥特：**

從經典教堂類型向較少完美系統化與原型性的形式變化；

追求抽象與線型的前哥特特徵的復蘇；

盛期哥特已變成了教條，被簡約化、簡單化或被精緻化與複雜化；

晚期哥特分裂成眾多不同的風格，但是此多樣性被統一於主觀主義之下，即出現了對空間的透視法闡釋；

從主體到客體的直覺性，為現代的“自然主義”作了鋪墊，並強調視覺表達上的無限性，透視滅點被定義為平行視線的交匯點；

建築師不再按照孤立的體塊而是按照完整的“圖畫空間”來觀察形式，一種如畫的體驗；繪畫、風景與室內通過使觀者感知到持續的多樣性與上帝造物的無限性而引入一種無限的感覺。

**建築師：**

勒·勞朴、德·沃貝斯、德·盧薩切斯、德·切萊斯、里不吉爾、德·蒙特里奧。

(Jean le Loup, Jean d'Orbais, Robert de Luzarches, Jean de Chelles, Hugues Libergier, Pierre de Montereau, etc.)。

**哲學家：**

亞歷山大、阿爾伯特、威廉、聖·保納文契、聖·托馬斯。

(Alexander of Hales, Albert the Great, William of Auvergne, St. Bonaventure, St. Thomas, etc.)。

**建築：**

重新出現對心理學的興趣；

在西立面較之于早期哥特的圖案顯得稍許活潑一些。

**哲學：**

建基於“生命的氣息”與“大地的塵埃”之聖經二分法之上的心理學。

請注意此處的心理學的相似性。潘諾夫斯基隨後又強調形式組織中另一個重要的相似性。

**盛期經院哲學：**

"Summa"，此概念不同於十一、十二世紀的較不完整、較不嚴格以及較不統一的形式組織，它是“簡潔的綱要”，是徹底而又系統的呈現。

由亞歷山大所寫的《神學綱要》(Summa Theologiae)。

家、英國等。對理性的至高無上的統合力產生了懷疑。此非中心化與對理性信心的降低之趨勢可以說是現象上的相似性。

**晚期經院哲學：**

由較少系統化與宏大性的呈現類型代替經典的"Summa"體系；

盛期經院哲學變得僵化，被庸俗化或被精細化；在1340年，發生了從盛期向晚期的轉移；

唯名論(nominalism)否認統一的真實存在，只承認局部的真實存在；

經驗主義(expericism)主張現實的特性只屬於那些可以被理解和感知之物、那些通過內心體驗的特定心理狀態與行為(快樂、悲傷、意願等等)；

唯名論與經驗主義的共同性是主觀主義(subjectivism)，它們割斷了理性與信仰的聯繫，把個體重新投入自我感悟與心理體驗中，最終消除了有限與無限之間的界限。

在此，我們看到了兩者之間大量的相似性，這可以用一系列的特徵性詞彙來描繪：向較少系統化的轉變；盛期形式被庸俗化或精緻化；從盛期轉向由強調自我感知與當限性的主觀主義統合的多樣化時代。

然而，在一個限定的時空範圍中對哥特／經院作了順時性的描繪之後，潘諾夫斯基轉而關注在更小的時空範圍內(1130~1270)兩者的共時性發展。他認為那個時期兩者之間聯繫的具體性超出了“平行主義”(parallelism)的程度，但又比個別性的“影響”更具有一般性。“不同於平行主義，此聯繫是一種真實的因果關係；與個別性影響不同，此因果關係是經由擴散方式(diffusion)、心態(mental habit)的普及而非一對一直接作用所致。心態是規範行為的原則，它在一切文明中都發揮著作用”(註2)。

潘諾夫斯基承認在行為之後存在許多的力量和許多傳達力量的渠道。“往往很難或不可能從許多力量中抽出形成心態的力量以及想象出傳達的渠道”(註3)。但是，他認為在1130~1270這段短時期內，經院哲學在教育中起到了統治作用。

僅僅是在這樣狹小的時空範圍內，中心統治才可能存在，他試圖一再縮小其話語的時空範圍，由此使他的比較操作更為有效。

“哥特風格，醞釀于本尼迪克修道院，由聖丹尼斯的蘇格爾(Suger)所創始，在偉大的城市教堂中達到其輝煌的頂峰。在羅馬風時期建築史中最偉大的名字是本尼迪克的

#### 建築：

視覺藝術通過一種精確而又系統化的空間劃分被連接起來，一種建築中“為清晰而清晰”的功能性背景；

對奧頓(Autun)的“最後的審判”大門入口與巴黎或亞眠(Amiens)的入口作了對比比較，以顯示後者所具有的完美的清晰性；

對1250年與1079~1096年的肖像畫作了對比比較，以顯示前者的清晰性；正是在建築中清晰化的心態達到最完美的呈現；

如同盛期經院哲學被表達的原則所控制一樣盛期哥特受“透明性原則”所左右；形成了從外面看明確且堅實但從內部看不定且通透的空間。

現在我們可以繼續獲得潘諾夫斯基比較操作的更多細節。

#### 盛期哥特：

受“通透原則”的支配；

從內部看顯得不定而又穿透的空間；

從外部看顯得肯定而又堅固；

把內部體積與外部空間區分開，但又堅持通過包容的結構使自己向外投射；

修士們，在盛期哥特時期是大教堂的修士們，在晚期哥特時期則是那些地區教堂的教士們”(註4)。

潘諾夫斯基認為，有兩條理由使建築師極易受到經院哲學的影響：一是建築師本人可能就是宗教人士，二是他們自己的工作——設計大教堂自然使他們與哲學家們打交道。建築師自己不大可能去閱讀原版的書籍，但是受到了經院哲學觀點的薰陶。他們都上過學，聽過布道、唱詩會與公共講座等等。

他提出建築可能受經院哲學影響的另一個社會可能性。“整個社會體系正在迅速朝著城市行業化發展。它提供了一個交往的場所，在那裡教士與普通人、詩人與立法者、立法者與藝人都能夠平等地聚集一堂。建築師，作為一個世俗的人，廣泛地旅行與閱覽，享有很高的社會地位，他本人看起來就像經院學者”(註5)，在此，潘諾夫斯基提出建築師與哲學家有時是同一個人的可能性。

既然建築必然受到經院哲學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如何發生的呢？他說，“建築師吸收和傳達著而不是應用著同時代思想的真義。他所能應用的只是那種特定的程序方法，它遵循著本質的方式，那種經院主義的存在理由”(註6)。我們已接觸到潘諾夫斯基的比較最重要的一點，它對文本初始所提出的期望給予了回答。在文本初始他尋求一種內在的“類似性”以求獲得某種“統一性”，從而識別出一個歷史時代。

他進而給出了詳細的比較以顯露頂盛時期的類似性。

#### 哲學：

“Manifestatio”，意指闡釋或澄清，是早期與盛期經院哲學的第一控制原則；信仰通過理性而得以澄清，而理性經由文本的呈現方式而被確立；經院哲學寫作形式的三條基本要求：

(1)完整性(充分的列舉)；

(2)按照分級的同源結構體系來組織(充分的連接)；

(3)清晰且逐級傳遞的信服力(充分的相互聯繫)；

“書”被劃分成標數碼的“章”，從一個命題到另一個命題；與柏拉圖(Plato)和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相反，經院學者覺得有必要使他的思想的條理性與邏輯清晰地呈現出來，即“為清晰而清晰”的宗旨。

#### 盛期經院哲學：

受表達(manifestatio)原則的支配；

神秘主義：寓理性于信仰中；

唯名論：使彼此相互分離；

嚴格地把信仰的神聖性與理性的知識領域分開，但又堅持此神性之內容保持清晰可辨；

追求“整體性”、總體結構的統一劃分與次劃分；  
 總體是由同源的最小單位構成，它們的平面呈三角形，相互共邊；  
 單個的元素，在形成不可分解的整體之同時，必然保持著各自的特徵，相互地獨立；  
 相互的可推論性；  
 從一個束柱橫斷面可推知整個系統的組織；  
 通過衝突的可能性的相互兼容與協調，獲取“最終的”解決方法；  
 就兩個完全的衝突主題而言，不可捨其一而偏重任何一方；雙方必須相互穿插而最終達成協調。

"Summa"體系；  
 通過分級的同源系統來組織；  
 清晰而又可傳遞的信服力；  
 神聖啟示的權威性往往相互衝突；  
 只有同時接受它們并不斷地再闡釋直至達成相互協調。

潘諾夫斯基認為此“為清晰而清晰”的宗旨貫穿了文化追求中的每個思維個體，並發展為一種普遍“心態”。此心態醉心于系統的劃分與次劃分、方法的顯露與韻律。“一種心態必須通過理性來使信仰“清楚明白”，而通過想像力來使理性明了，通過訴諸感官使想像力“清晰化””(註7)。

他認識到建築語言與哲學語言之間的差異。前者必須在除寫作之外通過物質形式展開自己，而後者只能在寫作中展開。他小心地運用圖示來說明自己的類比性操作：西立面的玫瑰窗，高側窗下的牆體組織，中廳束柱的相互協調等等。

我們已經解讀出潘諾夫斯基關於哥特／經院文本中的

比較痕跡。我們因此可能考察這些痕跡線並獲得某些有效的結論與問題。對比較的考察包括兩個方面：作為策略的比較和作為意義的比較。

對潘諾夫斯基的作為策略的比較之考察將關注于他的比較結構。對他的作為意義的比較之考察將強調其文本的內容與目的以及沿著比較的痕跡線比較在文本中的效用。

## 貳

我們通過解讀追求比較的痕跡線，通過質疑獲取比較的策略與意義。

潘諾夫斯基小心而又嚴謹地運用著比較的方法。如果關注于比較的形式性，我們能夠從話語中簡約出比較的結構。

| 比較的結構：          | 註釋：  |
|-----------------|--|
| 假設              | 歷史時代應該具有通過內在的相似性而建立的明確統一性；                               |
| ↓               |  |
| 目的              | 發現內在相似性；   |
| ↓               |  |
| 比較項             | 差異很大的現象之間：建築／哲學；   |
| ↓               |  |
| 比較項的時空限定        | 同一的時間與地理空間；  |
| ↓               |  |
| 中期的類比           | 相似的背景、同一的場地與時間；  |
| ↓               |  |
| 盛期的類比           | 同一的時間、相似的心理傾向、相似的形式組織；                                   |
| ↓               |  |
| 晚期的類比           | 同一的時間，相似的現象：地理空間、心理與形式組織上的傾向；<br>相似的盛期命運，朝主觀主義與無限性發展的傾向； |
| ↓               |  |
| 再次更明確地限定盛期的時空範圍 | 1130～1270；圍繞巴黎100英里的範圍；                                  |
| ↓               |  |
| 盛期的類比：討論兩者之間的關係 | 因果關係；  |
| ↓               |  |
| 傳達的渠道           | 擴散；  |
| ↓               |  |
| 類比的內容           | 組織程序而非思維方法；  |
| ↓               |  |
| 盛期的細部類比         | 形式組織原則 充分的列舉，充分的連接，充分的相互聯繫。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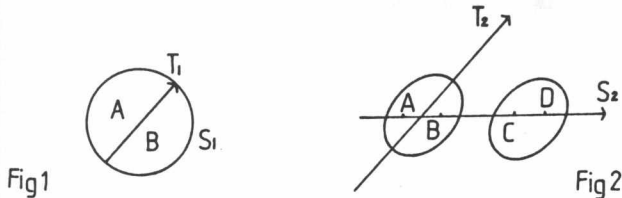


另一類平行：寫作／圖示。

我們可以從以上的比較結構推論出以下結論性陳述：

- (1)作為出發點的假設是很關鍵的，應具有策略性(strategic)意義。
- (2)應該有明確的比較目的來支持一般性假設。目的往往包括兩個方面：相似與差異。
- (3)必須有兩個比較項。相應於比較目的的相似性或差異性，比較項之間應具有作為初步約定的差異性與相似性，即可比性(comparability)。一般而言，可比性的差異與相似比目的的相似或差異更為明確。
- (4)應該有一個明確的比較時空框架。
- (5)應對比較的這樣一些方面作出清晰的描述：比較項的關係，雙方之間的傳遞渠道，類比內容等。
- (6)建築的比較與其他比較之間在形式上應該有所區別，前者的比較手段除了寫作之外還包括圖示。

在潘諾夫斯基的話語中，存在兩種時空攪架的區分：其一是決定比較場所即比較語境的關於比較項的時空限定(圖1)。在此時空範圍中，T1是比較項(即比較的對象，如圖ABCD所指)存在的時期，S1意指它們所處的地理範圍。T1和S1不完全取決於個體的比較者。另一個時空框架是比較的操作框架(圖2)，其中T2表示比較行為的時間特質——共時(synchronic)或歷時(diachronic)，S2意指比較項自身的特性——藝術、文學、哲學、社會與政治、宗教運動等等。T2和S2均由比較者自己策略性地加以決定。



我們應該注意到潘諾夫斯基在作為比較策略的“平行”與“共生”(concurrency)之間作了區分。根據韋氏大辭典，“平行”意指不同時間、場所、背景或來源的人或事件之間的生長、發展或行為上的相似性。而潘諾夫斯基的“共生”指向在一個明確且同一的時空範圍中不同現象之間的相似性。他清楚地看到“平行”追蹤中所蘊含的危險，因為“沒有一個人能完美地掌握一個以上的領域”。在有明確時空範圍的“共生”中，其相似性較之“平行”中的相似性要更顯著。潘諾夫斯基對早期、盛期與晚期的哥特與經院之間作了微分(differentiate)。在早期中，相似性寓於朝向主觀主義發展的傾向中，但是此主觀主義仍然屬於是沒有內在類比性的平行現象。他的比較重點是盛期，在那裡共生不再是時空間或主觀感受上的平行，而是形式組織可見的(visible)原則。此原則源自共同的心態，它正是潘諾夫斯基尋求的哥特時代的統一性。我們可以看見他是多麼小心而嚴謹地在兩個不同的時空框架中操作著他的比較進程。

至此，我們已經對潘諾夫斯基的比較結構有所了解。我們不禁要問，此結構作為一種策略是有效的嗎？對此問題的回答引導我們走向對作為意義之比較的考察。

潘諾夫斯基想要確認出建築史中的哥特時代。為了識別，他把建築置入那個時期的文脈中。在文脈中能獲取某種統一性，此統一性因此能支持對建築的時代劃分。統一性通過比較而確立：發現建築與哲學之間的內在類比性。其共性是“心態”，它喚起了某種形式組織的類型。潘氏認為此心態源自經院哲學。

對潘諾夫斯基而言，比較是劃分建築時代唯一且必需的途徑。時代劃分給建築賦予了意義，因此我們可以說比較內在於建築的意義之中。

潘諾夫斯基想要通過比較區分出一個歷史的時代。在比較中他嚴格地限定了S1-T1的範圍，它是比較的必需條件。既然一個明確的時空範圍已作為比較的必然條件被給予哥特時代，為什麼他還要把此時代作為比較的結果來尋求呢？一個悖論。走出悖論的唯一答案是他的“時代”不僅僅意指一個時間上的劃分，它還意指時間之外的東西。他的“時代”指向時間之外的“意義”。他尋求建築意義的時代，但此意義的時代只能經由比較而確立。這個通過比較過程的展開而呈現意義的寫作方式，正是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所謂的一種時延化(temporization)與間隔化(spacing)的“分延”(differance)過程(註8)。比較為潘諾夫斯基提供了微分“時代”概念的場所與機會。這給我們一個重要啟示，建築的歷史不僅僅是斷代史，於是，一個重要的推論就是，比較不是機械式表達的手段，而是一個有效展開建築意義的動態組織(economy)。

我們將對潘諾夫斯基通過比較獲取的意義加以考察。根據他的論述，建築的意義，即它的形式組織，源自於與經院哲學的真實因果關係，此關係通過擴散和心態的蔓延而所致——原則控制了行為。此心態源自於經院哲學。它能使人們形成一種對系統劃分與次劃分、方法呈現與韻律的向往。可以這樣認為，潘諾夫斯基模稜兩可地把經院哲學解釋為哥特建築之所以為哥特建築的根本理由(“why”)，前者是確立哥特時代的中心，後者從屬於前者。

然而，在論述哥特時代是如何地被確立之時(“how”)，潘諾夫斯基則指出，心態通過對理性的尋求而使信仰“更清晰”，通過想像力的尋求使理性“更清晰”，通過訴諸感官使想像力“更清晰”：寫作與建築的形式組織。由此推論下去，與潘氏的前面立論相反，建築在此不是對原初的(original)經院哲學的直接表現(expression)，而正是建築維持了信仰的可能性，建築呈現出(present)信仰。

從解讀出的潘諾夫斯基的這個悖論中，暴露出隱藏的“經院中心”的不穩定根基，它并不如常規所認為的那樣給予建築的存在以原初的基礎性支持，相反，建築的存在使經院哲學得以被確立。常規的哥特時代的先驗“經院中心”的神話由此破滅了。

潘諾夫斯基尋求的時代統一性是特定時空範圍的心態類似性。此心態實際上來自於某種對信仰模糊性的焦慮。

此統一性或心態是一種對信仰的普遍不穩定的感受。我們有興趣地注意到潘氏說在心態的擴散中經院哲學起到了教育的壟斷作用。但是似是而非的是，經院哲學的原初實際上是不穩定的，它需求具有清晰化與系統化形式組織的建築與寫作的支持。可以說此整體的、同源連接的、具有清晰信服力的哥特建築不是對神聖上帝的堅定信仰的表現，而是對此信仰、原初與中心之可靠性(authenticity)的否定。

潘諾夫斯基意欲通過比較獲取一個歷史時代的統一性，並由此給那個時代的建築賦予清晰明白的意義。然而在此統一性中，不存在作為起點的中心，中心消解於一種普遍的焦慮中，而此焦慮穿梭於不同的現象之間。建築與哲學的寫作把此焦慮內在於自身中，並通過個體的他(潘氏)的比較性註釋而顯露為心態的類似性。此類似的同一性只能存在于由比較的寫作所維持的建築與其他文化現象之間與之中(in-between)的約定(contract)。

與卡西爾(Cassirer)的象徵性空間意義不同：試圖圍繞作為象徵形式的空間觀念重構歷史的世界，潘諾夫斯基的建築意義源自於建築師的心態，一種對感性素材的心理態度。此心態屬於一個異質的(heterogeneous)世界，外在於任何單一中心的因果取向。

雖然潘諾夫斯基認為心態是經由單向運動所確立：建築的形式組織來自於“為清晰而清晰”的經院思想，但是此思想實際上不是一個自治的中心，而是只有訴諸感官才得以存在：建築、寫作與其他。因此，此心態是一個雙向運動的結果，它只有通過比較的旋繞的時空組織才能展現自己。

潘諾夫斯基的哥特建築／經院哲學的橫向比較是一種共時性比較模式，通過同一特定時代不同現象的并置(co-presence)來呈現那個時代的藝術共性。他通過對建築與建築之外事物的比較，一方面顯示了雙方的複雜互動關係，同時也揭示了建築的獨特本質，而此本質只有依賴於比較的展開才能被看到。

### 註釋：

- 註1. Panofsky, Erwin  
1957 Gothic Architecture and Scholasticism. Thames and Hudson London; Meridian Books. p2.
- 註2. Ibid. pp20-21.
- 註3. Ibid. p21.
- 註4. Ibid. pp22-23.
- 註5. Ibid. pp24-26.
- 註6. Ibid. p28.
- 註7. Ibid. p38.
- 註8. Derrida, Jacques  
1981 "Differance", in Margins of Philosoph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9. “分延”(differance)系德里達自創的一個名詞，它意指“區分”(differ)和“拖延”(defer)的雙重運動。意義的確立，是經由對概念(比較項)之間差異的持續微分以及對這些差異的無限能動操縱，而比較正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意義建構的有效策略與場所。